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4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

科目：中文寫作與英譯中測驗

適用系所：翻譯研究所

注意：1.本試題共 4 頁，請依序在答案卷上作答，並標明題號，不必抄題。2.答案必須寫在指定作答區內，否則依規定扣分。

一、中文寫作(50 分)

請簡短重述下文重點，勿超過 400 字。

誰能說誰是「真的」：潘柏霖〈媽媽說我是假的〉折射的倫理問題

作者：朱宥勳

2023/11/15_文學評論

每年十一月左右，向來是台灣獎額最高的「林榮三文學獎」頒布的時節。散文組首獎〈媽媽說我是假的〉公布之後，卻在短短數天內引發倫理爭議。

潘柏霖〈媽媽說我是假的〉一文之所以引發爭議，在於它擊中了台灣文學獎體制、以及當代文學創作對於「代言他人」、乃至於「挪用弱勢族群經驗」的敏感關節。這些問題環環相扣，是創作技術、文學倫理與贈獎機制交纏的結果，很難找到絕對的解方。因此，本文將展開各方說法，討論它所涉及到的各種可能與爭議。

11 月 13 日，《自由時報》正式刊載〈媽媽說我是假的〉一文。文章以第一人稱敘事，描寫了跨性別者在法律、手術與家人之間的糾葛。文章發表後，立即引發「是否代言、消費跨性別族群」的爭議。接下來，我們便以這起事件為中心，分項討論其爭議點與可能性。

首先，我們先來談談「代言跨性別」及其糾結：這其實源自於文學獎體制「弱勢優先」的傾向。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確定潘柏霖的生命經驗（也許他真有經歷散文內的一切，只是從未揭露過），但假設他或其他寫作者，在本人並非跨性別族群的前提下，寫了像〈媽媽說我是假的〉這樣的文章，便會有不當代言的問題。然而，這樣的「代言」為何是文學圈難以接受的？難道不可以將這種創作，視為「為議題發聲」的一種手段嗎？

要理解這個問題，必須先從文學圈「弱勢優先」的理念談起。自 1990 年代以來，台灣文學圈便開始意識到身份政治的問題。因此，在文學獎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4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

文學評論裡，往往會對「牽涉弱勢族群的作品」另眼相看，希望給予這類作品較多機會。這便是現在許多網友不以為然的「政治正確」的起源。但需要說明的是，這種思路並非完全以身份邊緣與否來決定文學價值，而是希望藉由鼓勵非主流的族群，挖掘更多元的文學樣態。長遠來說，這種機制反而能豐富文學的疆域。同時，給予弱勢、邊緣題材更多機會，也蘊含了「給這種出身的作者更多資源」的補救意涵。當主流社會缺乏弱勢發聲的機會，文學作為一種發聲管道，便希望能「廣開言路」，在市場機制之外，特意拔擢弱勢族群的作家。

雖然不是所有作家、評審都同意這套理念，但它確實是一股長年影響文學獎的力量。1990 年代，原住民、同志等題材大興，許多優秀的原住民作家與同志作家之躍上文壇，都與這套理念有關。然而，這套理念配上文學獎「匿名審查」的機制，便形成了尷尬的漏洞。為確保公正性，評審會在匿名狀態下討論作品。也就是說，就算你看到一個人寫了外籍移工或跨性別的困境，你也無法確認作者是否文如其人。上述的拔擢機制，就會因此出現尷尬的後果：1990 年代不只獎助了許多原住民作家，也獎助了不少「寫原住民題材的漢人作家」。

這正是「代言弱勢」在文學獎場域裡的倫理問題：本來應當拿去扶助弱勢族群的資源，被代言者掠奪了。在此，代言者不只是「代替弱勢說話」，更是侵佔了弱勢族群一席發聲機會，也侵佔了實質的資源挹注。這就像一個漢人冒充原住民，去利用原住民加分制度上大學一樣。

也因為這個問題非常「當代」，所以難有一翻兩瞪眼的共識，是一套正在形塑中的文學倫理。問題的核心仍是：如果一名創作者不具有某身份，卻以真假難辨的寫法獲取屬於該身份的「補救」，這是可以接受的嗎？

接著，我們來考慮另一層次的問題：如果〈媽媽說我是假的〉不只是「代言跨性別」，而是直接挪用了一名或數名真實存在的跨性別者的經驗，又會有怎樣的倫理問題？

創作者可不可以去寫他人的經驗？當然可以，絕大多數文學創作都會涉及他人。但是，如果寫出他人故事有造成傷害之風險時，創作者就必須更審慎處理。比如說，創作者沒有權力代替一名同志出櫃；創作者也不能寫出他人不願公開的隱私。凡涉及這種情況，通常我們會採取「知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4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

同意」和「去識別化」兩步驟——前者是事先確認當事人的意願，讓當事人有機會評估文章發表之後的衝擊；後者則是透過文學手法，盡量讓當事人的周遭社群難以對號入座，從而減低可能的傷害。

除了考量傷害，〈媽媽說我是假的〉的散文性質，又讓問題變得更加棘手。若〈媽媽說我是假的〉之原型真有其人，採取「第一人稱+散文」的寫法，本身就是一種「挪他人經驗為己用」的欺瞞。這與小說創作的狀況不同，任何讀者在閱讀小說時，都做好了「這些不可能全是作者經驗」的心理準備，一定有所虛構和轉化；但是，在散文的閱讀狀態下，絕大多數讀者都還是相信第一人稱敘事者的「告白」。

這種「搏感情」、真心換真心的交流，正是散文創作與閱讀的可貴之處。而當創作者破壞此一默契時，將他人的經驗收到自己的筆下，就算他完成了「知情同意」和「去識別化」的步驟，仍不能免於對讀者的傷害。那是交出了「黃金之心」，願意傾聽你生命故事的一群人——不管他是網路上的廣大讀者，還是在評審會議投票支持你的作家學者，都不會改變這種寫法的欺瞞性質。你能騙到他們，是因為他們真心相信你。

二、英譯中(50 分)

請將下列英文譯成通順的中文。

The Double Standard of Aging

by Susan Sontag

The emotional privileges this society confers upon youth stir up some anxiety about getting older in everybody. All modern urbanized societies—unlike tribal, rural societies—condescend to the values of maturity and heap honors on the joys of youth. This revaluation of the life cycle in favor of the young brilliantly serves a secular society whose idols are ever-increasing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and the unlimited cannibalization of nature. Such a society must create a new sense of the rhythms of life in order to incite people to buy more, to consume and throw away faster. People let the direct awareness they have of their needs, of what really gives them pleasure, be overruled by commercialized *images* of happiness and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4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

personal well-being; and, in this imagery designed to stimulate ever more avid levels of consumption, the most popular metaphor for happiness is “youth.” (I would insist that it is a metaphor, not a literal description. Youth is a metaphor for energy, restless mobility, appetite: for the state of “wanting.”) This equating of well-being with youth makes everyone naggingly aware of exact age—one’s own and that of other people. In primitive and premodern societies people attach much less importance to dates. When lives are divided into long periods with stable responsibilities and steady ideals (and hypocrisies), the exact number of years someone has lived becomes a trivial fact; there is hardly any reason to mention, even to know, the year in which one was born. Most people in nonindustrial societies are not sure exactly how old they are. People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are haunted by numbers. They take an almost obsessional interest in keeping the score card of aging, convinced that anything above a low total is some kind of bad news. In an era in which people actually live longer and longer, what now amounts to the latter *two-thirds* of everyone’s life is shadowed by a poignant apprehension of unremitting loss.